

诉讼

卡夫卡 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

647726

47.22
52-07



10005065

社料索清3

诉 讼

[奥地利] 卡夫卡 著

孙 坤 荣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Franz Kafka
Der Prozess

根据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1 年版译。

封面设计：秦 龙

诉 讼
SUSONG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19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frac{8}{8}$ 插页 2

198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8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1,400

书号 10298·223 定价 1.70 元

译 本 序

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是二十世纪奥地利小说家,现在已被公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在生前几乎无声无息,死后经过若干年,却变得遐邇闻名,对后继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卡夫卡于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犹太血统。他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百货批发商,“坚强、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言善辩、自满自足、高人一等、坚韧不拔、沉着镇定、通晓人情世故、有某种豪爽的气度”。^①他的母亲“总是温良恭谦地维护住她的最低限度的独立性”,“在家里任劳任怨”,“为事业、为家庭辛勤操劳”。^②正因为他的父亲太坚强有力,母亲太温柔恭顺,而两个弟弟幼年夭折,三个妹妹又是多年以后才出世,因此,父亲的专横狂暴,卡夫卡就首当其冲。这种父子间的冲突,在卡夫卡早期公开发表的代表作《判决》(1913)中,有过荒诞而又生动的反映。童年时代他在家庭的处境以及作为犹太人在布拉格的地位,在他的性格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懦弱、隐蔽、羞怯、内向,许多事情常常会猝然中止,缺乏事业心和进取心。

①② 见卡夫卡《致父亲的信》(1919)。

如同当时的其他许多居住在捷克的犹太人一样，卡夫卡从小受德语教育。一九〇一年他中学毕业后，入布拉格大学德语部^①，学习了两个学期日耳曼语言文学，后来迫于父命，改学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一九〇六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法律事务所和法院见习，次年十月，进入一家私人保险公司服务，一九〇八年七月起，又受职于半官方的工伤保险公司，直到一九二二年七月因病离职。由于卡夫卡染上肺结核病，几度疗养不见痊愈，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逝世，年仅四十一岁。

卡夫卡从小爱好文学，中学时开始读斯宾诺莎、达尔文、尼采的著作和易卜生的戏剧。大学时期开始创作，与同学马克斯·布洛德^②结为至交。他们两人经常参加布拉格的一些文学活动，从一九〇九年在一九一二年曾几度结伴去巴黎、苏黎世、卢加诺、米兰、魏玛等地参观游历。这时，德国作家赫贝尔和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作品对卡夫卡很有吸引力。以后，他对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基尔克郭尔德(1813—1855)的著作发生兴趣，也开始研究中国的老庄哲学。据古斯塔夫·雅诺赫^③在《与卡夫卡谈话》一书中介绍，卡夫卡

① 当时的布拉格大学分两个部分，一为捷克语部，一为德语部。

② 马克斯·布洛德(1884—1968)，布拉格犹太作家，卡夫卡好友，卡夫卡遗著的整理者和出版者，著有《卡夫卡传》等。

③ 古斯塔夫·雅诺赫(1903—1968)，轻音乐作曲家，一九二〇年三月当他十七岁时，经他父亲介绍认识了卡夫卡，以后就经常拜访卡夫卡，同卡夫卡一起散步，后来写了《与卡夫卡谈话——记录和回忆》(1951年初版，1968年修订版)。引文见德文原著第171页。

说自己“长期以来相当深入地钻研过道教”，“差不多拥有所有老子著作的德文译本”。以上这些作家、思想家对卡夫卡的人生观和创作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卡夫卡与进步的捷克知识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情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但保持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反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沙文主义，对战争持消极态度。卡夫卡的个人生活十分不幸，三次订婚三次解约，疾病缠身，性格上充满矛盾，有很多弱点，这就使他难于从压抑和麻痹着他的处境中解脱出来。他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但看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突出地反映在他的小说和日记中。从他在一九一〇到一九二三年间充满磨难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卡夫卡孤独、苦恼、自怨自艾的种种矛盾之情，他把自己的创作视为“我梦幻般的内在生活的表现”。

卡夫卡创作非常勤奋，但完全是在业余时间，后来并且是在和病魔斗争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作品不是很多。除生前出版过《判决》、《变形记》、《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等几个短篇小说集外，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都没有完稿。他曾留下两封遗书给好友布洛德，要求布洛德把他的所有遗稿（包括日记本、手稿、来往信件、各种草稿，等等），“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①。但是，布洛德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不仅没有焚毁他的遗稿，而且把能够搜集得

① 详见本书附录：马克斯·布洛德为《诉讼》第一、二、三版写的后记。

1929/10

起来的所有作品，包括已经发表和未发表的、草稿和片断、日记和书信，统统整理编辑出版。一九二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分别出版了《诉讼》（一译《审判》）、《城堡》、《美国》三部长篇小说；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出了六卷集，一九五〇至一九五八年又出了九卷全集（卡夫卡生前发表过的作品只占其中一卷篇幅）。

现在，人们再去争论布洛德是否有权违反卡夫卡的意愿，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发人深思的倒是卡夫卡的作品多卷集公开发表后，在世界文坛上引起的巨大反响和高度评价，同时也在研究者中引起了热烈的争议。从三十年代起，卡夫卡开始受到西方评论界的注意，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他的声誉更是与日俱增，评论他的文章数不胜数。据瑞典学者哈雷·雅尔伏的统计，截至一九六一年世界上对卡夫卡的评论文章和书籍达五千余种；据西德学者约阿希姆·翁塞德一九八二年出版的专著《弗兰茨·卡夫卡》中说，世界上研究卡夫卡的出版物已逾一万种，并且还在继续增加。英国诗人奥登在《卡夫卡问题》一书中认为：“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那么，卡夫卡是首先会想到的名字。”^①奥地利文学评论家费歇尔称赞卡夫卡“是继承了阿里斯托芬、拉伯雷、斯威夫特等人的光荣行列的、幻想讽刺作品的杰出大师”。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奥茨推崇“卡夫卡是本世纪最

① 转引自《世界文学》1979年第1期第193页。

佳作家之一，时至今日，且已成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人物”。①西德当代著名文学史家汉斯·马耶尔教授也认为，卡夫卡是近百年来德语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家之一。②

五十年代末，西方的“卡夫卡热”波及苏联和东欧国家。最早发表肯定卡夫卡的文章的民主德国文艺批评家保尔·雷曼称卡夫卡“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天才。他的许多随笔证明，卡夫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资产阶级人物的心理有一些极为深刻的见解”，并指出，“进步的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揭开伟大作家卡夫卡最有价值的作品的意义”③。一九六三年卡夫卡诞辰八十周年时，在布拉格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尽管在会上和会后都有激烈的争论，颂扬者把卡夫卡比作“犹如预示着又一个春天来临的第一批燕子”；④有保留的评论家则提醒大家“注意不要把蝙蝠与可爱的燕子混淆起来”⑤。但是，没有人再全盘否定卡夫卡了，而是从不同角度来探讨卡夫卡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以及他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

西方世界所以对卡夫卡发生浓厚的兴趣，认为有了“新

① 奥茨：《卡夫卡的天堂》，见《外国文艺》，1980年第2期第284页。

② 汉斯·马耶尔1980年9月访问北京时的学术谈话。

③ 见民主德国《魏玛文丛》1957年第4期：《卡夫卡小说中所提出的社会问题》。

④ 加罗第（法共文学评论家）：《卡夫卡与布拉格的春天》，载《法兰西文学报》第981期（1963年6月出版）。

⑤ 库莱拉（民主德国文学评论家和作家）：《春天、燕子与卡夫卡》，载《星期日》周报1963年第31期。

发现”，这与西方社会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法西斯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子恐怖，战后的动荡局势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从卡夫卡神秘而离奇的小说中，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所谓“现代人的困惑”；人们也从卡夫卡小说的多解释性中，去认识自己和人类社会。

奥匈帝国是欧洲有名的君主专制国家，哈布斯堡王朝长期以来对外侵略、称霸，对内实行家长式的暴虐统治和民族压迫。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个帝国实际上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内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异常尖锐。卡夫卡生活在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目睹各种社会现象，特别是他曾长期在工伤保险公司工作，接触到部分社会实际情况，对那种被资本家摧残的工人充满同情，认为“富人的奢侈是以穷人的贫困为代价的”，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一定认识。卡夫卡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面对复杂而又残酷的现实，他不能无动于衷。但他又不愿落入窠臼，走别人已经走过的创作道路。他要摆脱传统创作的束缚，闯出一条新的路子来。因此，他努力探索新的创作方法来反映观察到的社会现实。但卡夫卡对创作要求很高，对自己的绝大多数作品总不满意，经常修改，不轻易发表；并且内心充满着矛盾，许多作品都没有完稿，也不可能完稿，临去世前还要求焚毁遗稿；而令人遗憾的是他自己也确实已经销毁掉了一部分手稿。

卡夫卡遗留下来的长篇小说一共是三部，即《美国》、《诉讼》、《城堡》。这几部作品是在作者愤怒的时候及时被转移出来并妥善保存起来的。从这几部作品中可以看出，卡夫卡不仅擅长写短篇小说，同时也是写长篇叙事体裁的能手。这几部长篇同他的短篇小说一样，贯穿着社会批判的主题。

《美国》成书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原名《失踪的人》，后来布洛德把它出版时改成现在的标题。小说写一个名叫卡尔·罗斯曼的青年，因受一个中年女仆的引诱而被父母所迫离开家乡来到美国，他在船上为一个受欺侮的司炉打抱不平，在纽约港突然遇见舅父——身为参议员的百万富翁，因而过了几个月豪华的生活，后来又因违犯家规被撵了出来，流落街头，当过电梯工人，又沦为一对流氓男女的仆人，后应征为剧院的工人……小说没有写完。卡夫卡从未到过美国，这部作品所写的实际上是他所虚构的普遍化了的资本主义世界，诸如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劳资对立、工人结社、罢工游行、党派斗争等情景都跃然纸上，创作手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作者自己也在日记中说过，这是“对狄更斯的直接模仿”。这部小说的第一章曾作为短篇小说在一九一三年单独发表，题名《司炉》，获得一九一五年德国冯塔纳奖。

《城堡》成书于一九二二年，是卡夫卡逝世前两年写下的作品，非常富有卡夫卡的特色。小说主人公K自称是土地测量员，经过长途跋涉，从家乡赶来城堡，准备履行自己的职责。K先在附近村子里暂时住下，但城堡就在眼前，却

可望而不可即，永远进不去。主管K工作的是一个名叫克拉姆的部长，K千方百计要见到克拉姆，但始终达不到目的，最后甚至断绝了与城堡的一切联系。小说没有写完，据布洛德在《城堡》第一版后记中说，卡夫卡计划的结局是，K将“奋斗至精疲力竭而死”，在弥留之际，城堡传谕，准许K在村中居住和工作，但不许进城堡。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诸如：封建专制压迫、社会等级森严、官僚腐化荒淫、机构庞杂无度、人间世态炎凉、人民苦难深重等等；其中特别是城堡，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是整个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它阴森地窥视着广大黎民百姓，给人民构成致命的威胁。《城堡》是一部奇特的小说，故事情节怪诞离奇，象迷宫一样，叫人捉摸不透；艺术手法标新立异，独辟蹊径，令人思索无穷。

《诉讼》开始创作于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九年基本完成。布洛德在一九二〇年得到卡夫卡的《诉讼》手稿后，曾在~~一九二~~一九二一年的《新观察》上发表过一篇论述卡夫卡的文章，其中谈到《诉讼》是“卡夫卡的最伟大的作品”，这部作品“在我看来已经完成，而在作者看来当然没有完成，并且不能完成，也不能发表”。但是，布洛德在卡夫卡去世后一年，首先出版的就是这“不能发表”的《诉讼》。以这部小说为先导，卡夫卡的作品在西方文坛上愈来愈受到重视，卡夫卡的声誉也愈来愈高。后来，评论界都认为，《诉讼》是“卡夫卡式”小说形成的标志，最能代表卡夫卡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

所谓“卡夫卡式”^①，是目前西方评论界常用的一个新词，它表达一种任人摆布、无法自主、错综复杂、似真似幻的处境，《诉讼》正是描述这种状况的典型作品。

《诉讼》的主人公约瑟夫·K是银行的一名高级职员，他在三十岁生日的早晨，突然被法院逮捕了。奇怪的是K的被捕仅仅限于法院看守给他一声通知，后来法院曾传讯过他一回，但从来没有公布过K的罪行和罪名。而K依然行动自由，照常上下班，同过去一样生活。K起先对被捕非常愤慨，曾当面讽刺看守和监督。第一次开庭时，他在法庭上大声谴责司法制度的腐败，揭露官吏的贪赃枉法，并决定根本不去理睬这桩案子。但事实上他总忘不掉这件事，内心压力越来越重，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负罪感。他自动上法庭去探听，参观设在顶楼上的法院。K对自己的案子越来越关心，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他对银行里的职务感到厌恶，为自己的案子到处奔忙。但聘请的律师除了用空话敷衍外，几个月都写不出一份抗辩书。K又向一位为法官画像的画家求教，也没有得到什么帮助。最后K在教堂碰见一位神父，这神父讲了一个《在法的门前》的寓言（这个寓言卡夫卡曾作为短篇小说在一九一五年单独发表过），告诉K说，要找到“法”是不可能的，人只能低头服从。不久，K被执行死刑。在他三十一岁生日的前夕夜里，两个穿着大礼服的人把他架到郊外采石场，用屠刀把他戳死。K最后

① 卡夫卡式，德文是Kafkaesk，一个新出现的词汇。

说：“象一条狗似的！”好象他人虽然死了，而失败的耻辱却依然存在于人间。

据布洛德在本书《后记》中说：“卡夫卡认为这部长篇小说是未完成的。在已经收在本书内的最后一章之前，还应描写这个神秘的案子的某些阶段。可是，根据作者口头上表示过的看法，这个案子永远不能进到最高法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永远不会完结，也就是说，这部小说可以永不完结地续下去。”但是，从整体上看，《诉讼》是一部完成之作。有些片断，如《梦》这一篇卡夫卡自己加上标题单独发表了，有些未完成的章节同全书关系不大，布洛德把它们收在卡夫卡遗著里了。因此，已发表的《诉讼》是一部有头有尾的完整的作品。

从表面上看，《诉讼》是一部荒诞的、非理性的小说，但它确实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问题。这部作品通过一个公民以莫须有罪名被逮捕，最后被处死的故事，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庞大的官僚机构和腐败的司法制度。卡夫卡没有正面去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而是选择了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司法制度，运用象征的、夸张的艺术手法，通过主人公内在情绪的发展变化，别具匠心地达到揭露社会现实的目的。“K生活在一个法治的国家里，人人安居乐业，所有的法律都在起作用，谁敢在他的住所里侵犯他呢？”（第一章）K保证自己无罪，但还是免不了遭到逮捕。试想，一个人无辜被捕，在诉讼过程中，处处碰壁，一筹莫展，精神上受到的压力，心灵上受到的摧

残，是多么的严酷啊！任何一个公民一旦被这个法律机器网罗进去，就终身无法摆脱。正如K所说的：“法院一经对某人提出起诉，它就坚信这个被告有罪，如果要消除这种信念，那真是困难万分。”（第七章）这种残害百姓、草菅人命的事，决不是个别的。约瑟夫·K在胡尔德律师家碰到的粮食商人布洛克不过是另一个受害者。布洛克为自己的案子申诉了差不多有二十年，中间也换了几个律师，但递到法院去的抗辩书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成了一堆废纸。他被弄得倾家荡产，本人也近乎痴呆。在某种程度上，布洛克的精神创伤和生活处境比K还要糟糕。（第八章）

卡夫卡在《诉讼》中，通过K的遭遇，层层剖析了官僚专制统治和专横暴虐机构。K在第一次开庭时就慷慨激昂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司法制度的罪恶：“毫无疑问，在这个法庭的一切活动背后，我指的是在我的案子上，也就是逮捕我和今天审讯我这一系列活动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机构。……它的存在不外乎是，把无辜的人逮捕起来，对他们进行莫名其妙的审讯，大多数情况下，同我的案子一样，毫无结果。正因为整个都是这样毫无意义，那又怎么能够避免官员中的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的现象呢？这是不可能的……”（第二章）但是，令人更加难以容忍的是，这种罪恶的司法制度不会有丝毫的改变，律师胡尔德对K说：“法院这个庞大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好象永远处于悬浮状态，如果有人要自愿对它作一些改变，他就得冒着失去自己的立足点和跌得粉身碎骨的危险，而这个庞大机构自身对于这

种小小的干扰很容易被它的机构的其他部分——因为所有部分都相互关联——所补偿，一切又都恢复原状，保持不变；如果说它有什么改变的话，这倒是很有可能的，那就是变得更顽固、更严重、更残酷、更恶劣。”（第七章）

在阶级对抗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异化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的特定现象，是带有普遍性的。卡夫卡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存的社会关系看作压迫人的异己力量，他的许多作品都描写了孤独的人（不少是“小人物”）在各种异己力量的控制下不断挣扎，但结果却是自己进一步非人化，甚至分裂、变形、死亡。《诉讼》也是描写了这样一种异化主题。法院本来是维护正义和真理、保护人民利益的机构，但《诉讼》中的法院（它虽然只描写了一个秘密法院，但其他法院甚至最高法院情况更严重），却违背了它本身的目的，成为贪赃枉法、迫害人民的机构；人们自己建立和操纵的法院，却反过来控制了人，把人变为隶属于自己的非人格化的工具。卡夫卡正是通过法院这一异化力量的描写，从本质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罪恶和灾难并不是由于某一个人的不人道所造成的，而是在于整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诉讼》中的主人公约瑟夫·K本人是个异化的人物。他在书中表现出来的孤独、陌生、无能为力、没有目的、没有准则、充满矛盾思想和行动，都说明他是作为一个没有个性的“物”或抽象的“人”而存在的。他有时做一些自我反省，是想恢复独立的自我意识，竭力摆脱自我异化；但在那样的社会制度下这是不可能成功的。K同法院这股邪恶势

力的斗争，具有极大的悲剧意义；他在挣扎中处处碰壁，更增加了他的孤独感和困惑感。总而言之，《诉讼》通过K的命运、个别人对资产阶级司法机构的关系，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日趋严重的异化现象，并且最早地在长篇小说中表现了异化的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诉讼》不单单是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折磨和摧残，而更重要的，是从哲学（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角度暴露了扭曲的西方社会，探讨了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问题。所以，《诉讼》成了卡夫卡“最伟大的作品”，在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文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优秀的文学作品，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总是统一的。卡夫卡的《诉讼》，思想内容怪诞离奇，艺术形式独辟蹊径。他摆脱了小说创作的传统束缚，在艺术风格上与前辈作家迥然不同。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传统小说，往往通过情节和场面来塑造人物形象，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还着力刻画出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卡夫卡与这样的创作方法大相径庭。

卡夫卡汲取了象征派诗歌中的暗示、烘托、对比、渲染和联想等手法，在自己的小说中以一种“卡夫卡式”的形象塑造和多层含义的隐喻直接地表现人物的精神情绪和心理感受。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大都是固定的、没有发展的，但其精神情绪和心理感受的变化，却是没有穷尽的。《诉讼》中描写人物和事件在象征方面的多解释性，历来是

卡夫卡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约瑟夫·K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这个法院和法庭的性质怎样？画家画室里的肖像画上的女神隐喻什么？《在法的门前》那则寓言究竟说明了什么？杀死K的两个刽子手究竟是什么人？处死K的情景和K最后的话意味着什么？许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约瑟夫·K越是到处奔忙洗刷自己的罪嫌，犯罪感却越是严重，最后心甘情愿地被人用刀戳死。卡夫卡利用这种荒谬性的手法，来叙述人物的情绪和思想，强迫读者自己来体验，使读者产生“多么荒谬啊”的感慨，以引起无穷的思索。卡夫卡用荒谬的情节表现主题时，采用的是客观的、冷冰冰的冷漠语调来进行叙述的。《诉讼》的开头就象一篇新闻报道：“一定是有人对约瑟夫·K进行了诬陷，因为他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却在一天早晨被捕了。”即使是描写K最后被杀害的情景，作者也是冷漠的，完全无动于衷的：“……其中一位先生的双手已经扼住K的咽喉，另外一个便把屠刀深深地戳进K的心脏，而且还在里面转了两转。”这种冷漠的描写方法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够生动，缺乏艺术性；但是，作者正是通过这种超然的语调和简短的句子使平庸显得可怕，又使可怕变得平庸，以激起读者的理性，从而去思考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毫无疑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对卡夫卡的创作有极大的影响。在《诉讼》中，传统的那种描写景物、安排故事的写作方法是很少见的，而直接反映主人公意识的流动状态，即意识流手法则俯拾皆是，使作品蒙上了一种梦魇般的气氛。